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 形态与乡村社会

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 万安暴动为中心

社会
2014·5
CJS
第34卷

应 星 李 夏

摘要: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 with 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关键词:组织形态 曾天宇 万安暴动 乡村社会

CCP's Local Leader,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1920s, Illustrated by Zeng Tianyu and Jiangxi Wan'an Rebellion

* 作者 1: 应 星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Author 1: YING Xing, School of Soci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E-mail: yingxing@126.com; 作者 2: 李 夏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Author 2: LI Xi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本文是第一作者主持的 2014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形态研究”(14YJA840016) 的阶段性成果。 [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Country Society: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14YJA840016) sponsored by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本文也是第一作者与方慧容联合指导的中国(接下页)

YING Xing LI Xia

Abstract: The CCP transplanted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as its own organizational system at its founding days. This system underwent difficult adjust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fter the August 7th Meeting in 1927, the CCP started organizing rebellions in rural areas, which incurred severe challenges to its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and capabilities. The particularity of armed rebellion made the relationship more complex between local party who organize the rebellion and the upper level of party, as well as between the leader of the local party and the party system. Jiangxi Wan'an rebellion was one of the rebellions organized by the CCP after the August 7th Meeting. Zeng Tianyu, head of the Wan'an rebellion, represented a certain type of local leaders of the CCP in early times. Moreover, the conflicts in the CCP organizational system exposed in the organizing of Wan'an rebellion were also typical in the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War. Employing documents, data of organizations, memoirs, chorographies and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CCP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Zeng Tianyu's life history and ethos,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Wan'an rebellion, and the effort and failure of the upper level of party which attempted to strengthen the CCP organization in Wan'an. This paper uncovered three kinds of tens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early CCP. They are (1) tension between the authority of the officials and personal factors, (2) tens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and the autonomy of local leaders, and (3) tension between the revolution organizing and traditional resources and local interests. These tensions reviewed above can also explain a series of CCP's organizational events which happened at the same period.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form, Zeng Tianyu, Jiangxi Wan'an rebellion, rural society

(接上页)政法大学历史社会学研究小组的集体成果。本文从问题构思到分析框架再到细节处理,都得到了方慧容诸多重要的帮助。也感谢小组成员孟庆延、马学军和齐群在无数次讨论中的积极参与。本文在反复修订过程中还得到了海内外社会学界和史学界以下朋友的批评、点拨与鼓励,他们是:周飞舟、渠敬东、黄道炫、王奇生、杜丽红、徐晓宏、罗琳、杨念群、周雪光、罗敏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移植了俄共(布)的基本组织制度。到1927年6月1日,由新选出的中共“五大”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把联共(布)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共的组织原则。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大多来自受“五四”运动民主氛围熏染的学生,对这种强调纪律严明的列宁式政党的组织观念并不太适应。那些去苏俄留学的革命青年往往感到最新奇的就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郑超麟,2004:193)。亲历了江西共产党组织建立过程的游伯伦¹也在回忆中指出,当时的江西青年“最反对的是那种束缚他们个人自由的‘团体纪律’”(袁学黄,1934:331)。民主集中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经历了漫长的调适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开端是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苏维埃革命。当时,随着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空前的理论挑战,在革命参与者中,困惑、恐慌、沮丧、颓唐等各种复杂情绪泛滥。而中共高层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接受了共产国际为中国定位的革命阶段和暴动理论,打出了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在革命陷入低谷的时候,却要开始组织武装暴动,创建苏维埃政权,这对党组织的战斗力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日本学者高桥伸夫(1999:168—180;2006:30—58,112—134)提出,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原有的组织散漫性到大革命结束后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他的研究以鄂豫皖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为例,从党的构成、党内联系以及党组织和党外群体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证。王奇生(2002)也指出,1927—1932年间广东党组织松弛涣散,支部生活有名无实,党内交通和情报传递困难,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虽然王奇生基于其研究对象而谨慎地称其结论仅是对广东中共组织的地域性考察,但他的研究结论至少对于广东组织暴动的党组织是适用的。这两位学者将以往在中共组织史研究中对党的组织路线和高层人事斗争的关注转向对党的地方组织的实际运作机制的关注,无疑是非常有眼光的。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限于

1. 在本文所引的这个历史文献中提到的“游伯伦”,实名“刘伯伦”,又名“刘拜农”,江西铜鼓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江西建立时的第一任临时书记。参见刘锋,1989:34。

最基层的党支部的运作,并没有对位于党的高层组织与基层组织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党组织的运作展开深入研究,而仅仅涉及各级党组织之间联络不畅的问题。王才友(2013)以江西省委为中心研究了江西暴动的策动与终止,但他的研究视角也未能触及省委以下的中间层级党组织的运作,而中间层级党组织的运作是研究中共组织形态的一个关键环节,大革命后各地武装暴动的兴起和根据地的创建正是依赖中间层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²

在对中共中间层级党组织的研究中,地方精英论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视角。此视角始于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所提出的“根据地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推进取决于地方干部能否灵活地根据不同的地方情境来实现中央的政策(范力沛,1985;Hartford and Goldstein,1989)。在这种范式的影响下,韦思谛(Averill,1995)对江西苏区的研究、陈耀煌(2002,2003,2004)对鄂豫皖苏区及闽西苏区的研究都指出,中共之所以最初能够在乡村社会发动革命,其重要的依靠力量是出身当地精英家庭的革命者。这些地方干部既是苏维埃革命的推进者,但在革命危及地方利益时也可能与作为党的利益化身的外地干部发生冲突。何友良(2009a,2009b)对江西地方领导群体和外来领导群体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这种范式的影响。地方精英论将地方史和社会史带入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共中间层级的组织形态,并重视对地方党组织中身份群体的辨识。但是,机械地划分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用利益来解释地方干部的行为动机及其与外来干部的纠葛,都过分简化了地方党组织当时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生态。

“八七”会议后,中共一方面为克服陈独秀时代所谓“家长制”的影响,强调加强党内民主,使党的下层群众能够参与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的决定(中央档案馆,1989b:290,473—474);另一方面为克服政令不畅

2. 中共早期的组织层级及名称有较频繁的变动。基于本文的研究时段,我们按照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来划分中共的组织层级:高层组织是指中央和省委两级,中层组织是指市委或县委,而基层组织是指区委和基层党支部。这一党章修正案虽然取消了以往党章中所规定的特委组织,但事实上,在1927年到1928年各地组织武装暴动时,又普遍成立了若干隶属省委领导的特委,有些地方还成立了隶属特委领导的行动委员会。我们将这些特委和行动委员会也视为中间层级的党组织。感谢黄道炫和杜丽红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的提醒。

的问题,又着手整顿党内政治纪律,强调“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因此,“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民主的民权主义”(中央档案馆,1989b:478、305)——集权和民主这种双向的要求如何在实践中塑造党内的组织关系,党内的组织制度与中国传统乡村的关系形态又是如何交织作用的,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更何况,武装暴动的诸种特殊性使组织暴动的地方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之间、地方党组织领袖与党组织本身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在大革命失败初期全国各地举行的武装暴动中,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1月江西万安县先后举行了四次暴动,其暴动规模并不算大。尽管在第四次暴动后建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但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不久即告失败,未及建立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因此,万安暴动在以往的中共党史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也罕有人研究。但是,在筹划和组织万安暴动中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却颇具典型性,对于我们理解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乃至在土地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中所面临的党内组织矛盾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且,万安暴动的主要领导者曾天宇与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韦拔群、李文林、傅柏翠等在出身富家、经历复杂、见识广远及精神气质等方面颇多相似之处。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及精神气质的解剖,也有助于我们勾勒那个时代某一类型的中共地方领袖的精神群像。因此,本文选择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研究对象。

二、万安暴动的过程及其问题

万安暴动发生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提出革命正处在准备新的高涨时期,据此,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各地组织农民武装暴动(中央档案馆,1989b:294—295)。江西省委得到“八七”会议的精神后,也开始策划省内的暴动。1927年9月底,江西省委决定将全省划为六个暴动区,分别建立中共特委进行领导。³10月,省委决定将赣西暴动的起点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万安县(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3. 实际上只成立了赣北、赣西和赣南三个特委。参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7:66。

1986b:53)。中共长江局代表余球、省委代表汪群、团省委书记吴振鹏以及赣西特委代表曾延生等一批干部先后来到万安指导暴动工作。10月中旬,成立了万安暴动的领导机构——行动委员会,书记为万安籍党员曾天宇。11月,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万安农军开始了第一次对万安县城的攻打。先后经过了三次失败的攻城后,万安农军又在1928年1月9日发起了第四次攻击,最终成功地占领了万安县城,成立了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此后,由于强敌压境,中共于1月23日撤出了万安县城,短暂的万安暴动过程至此结束(万安县委党史办,1988:6—13;张世熙,1988b:66—71)。

1927年10月省委决定在万安进行暴动后,负责督察江西暴动的中共长江局军事特派员兼江西省委委员宛希俨⁴来到万安,非常不满以曾天宇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对万安暴动的领导。11月24日,当行动委员会领导的第一次攻城失败后,宛希俨再次来到万安召集紧急会议,取消了行动委员会,同时将万安籍的县委书记张世熙撤职,而以四川籍的中共长江局代表余球代理县委书记(万安县委党史办,1988:9;何隆亮,1991:8)。12月4日,江西省委根据宛希俨的汇报,致信赣西特委,严厉批评了万安等地在工作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10—113)。12月19日,江西省委又印发小册子《什么是机会主义与怎样铲除机会主义》,在讨论机会主义的表现时,将万安暴动中的许多情况作为例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28—130)。中共中央后来还给了曾天宇留党察看的处分(许大权,1988b:136)。

在万安暴动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探究:

第一,江西省委对万安党组织的第一点不满是万安县委软弱无力,而万安行动委员会“因没有党的领导,一切行动完全是由少数个人意志所支配”,“一般同志的心目中,都只认识少数活动的个人(所谓老师)而不认识党”,党操纵于所谓“党阀”之手(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10—111、159)。省委这里说的“个人”、“老师”、“党阀”指的都是万安行动委员会书记曾天宇。不仅省委有这种批评,时任万安县委书记的张世熙后来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的发言也有类似的批评(张世熙,

4. 宛希俨的长江局军事特派员身份,参见罗亦农,1999:311。

1988b:66—67)。那么,曾天宇到底是怎样一个革命者?为什么在万安革命者心中,曾天宇就是党的化身?为什么在万安暴动中,身为县委书记的张世熙既无法领导县委,也无法指挥暴动,而曾天宇却可以在暴动中指挥一切,甚至还可以改组县委(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8:21) ?

第二,省委对曾天宇的另一不满在于,曾天宇虽在万安掌握了领导暴动的一切权力,却偏偏对省委作出的攻占万安城的指示表现消极。“万安县城反动派的力量,本来非常微弱,只要有少数的武装农军和农民群众联合,便很可以占领起来。但行动委员会负责同志,始终认为这些微弱的反动势力不能为害,无占领之必要;且恐因占领而糜烂地方,失去本地人的同情”(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11)。曾天宇为什么认为没有占领万安城的必要?所谓对“糜烂地方”的担忧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三,中央和江西省委为强化万安的党组织做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的效果如何?

要真正弄清这些问题,既要深入研究曾天宇这样处于革命风暴中心的人物,又要研究这些革命风暴赖以形成的局势和结构;既要仔细辨析万安暴动中的史事人物,又要把万安暴动放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中去理解。因此,本文的旨趣在于综合使用各种党史资料(尤其是公开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史资料及内部发行的《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和《江西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地名志、县志、省志及民国史资料等,将中共党史、社会史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解析这些历史问题。

三、曾天宇:革命理想与组织观念的张力

曾天宇 1896 年 9 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罗塘墟村背村,父亲曾秀升是商业资本家兼地主,担任过万安县商会的会长;曾天宇的兄长曾振五在留学日本期间开始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1916 年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江西万安县分部长,1919 年当选江西省参议会议员(陈立明,

5. 1927 年 12 月 4 日江西省委致赣西特委的信的全文载《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06—113)。但此处引用的这个节本补全了全本所脱漏的“(曾)澜(挽)”一字(曾澜挽为曾天宇的别名)。故在此采此节本。

1990a:76;耿艳鹏,1996:42)。富裕的家境使曾天宇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兄长的影响、时代的潮流以及新式学校的氛围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前曾天宇在万安县立高等小学就读。1910年万安县立高小的执事由留日回来的萧炳章担任,而萧炳章当时的秘密身份为同盟会万安县分部部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萧炳章和县立高小另一位老师刘振群等在万安组织了学生军响应革命(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2007:359;童扬藩,1986:54—55)。从曾天宇后来与萧炳章及刘振群的密切关系可以推断,曾天宇当时很可能参加了万安的学生军。

由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行动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上——反清,而这个目标一达到,革命团体原有的分歧就凸现出来,革命联盟也随之解体(李剑农,2002:322)。民国建立后,各个政治派别曾幻想辅佐某一军阀逐渐过渡到议会政治,或者通过合纵连横实现新的统一,结果都宣告失败。而随着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运动的开展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到1924年国共合作时,社会各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目标,即“反帝、反军阀”。在这个新的奋斗目标中,“五四”一代学生是革命的生力军,也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和1924年重建的中国国民党竞相争取的对象(吕芳上,1994;王奇生,2010:66—101)。曾天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他的中学和大学学习的。

曾天宇1913年进入南昌心远中学读书,与张国焘同班(薛隆基,1991:129)。心远中学是江西著名教育家熊育钊的家族创办的私立中学,注重科学和英文,教学质量很高。熊育钊本人思想较为开放,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因此,心远中学具有两种传统: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程天放,1986:12—25;张国焘,1980:30—32)。曾天宇在这里更多接受了后一种传统的熏陶。

1917年曾天宇中学毕业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钟家柱等,1985:16)。他去日本留学直接受到留学日本并曾在万安高小任教的萧炳章和刘振群的影响。萧炳章1913年再度留日时就读的正是早稻田大学(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2007:359;童扬藩,1987:16—17)。当时,日本是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重要策源地(李博,2003:79—103),而早稻田大学更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中国留学生

的重镇。曾天宇到早稻田大学时,李大钊刚刚回国,而与他同年到早稻田的则有彭湃(安藤彦太郎,2010:101—151)。按照当时早稻田的规定,中学毕业生须先经过预科才能进入本科(韩一德,1989:305)。所以,曾天宇到东京后很可能与彭湃同在成城学校补习日语,为正式进入早稻田作准备(安藤彦太郎,2010:135—136)。1918年3月,曾天宇与彭湃一起参加了反对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中国留学生运动,并于同年5月罢学回国。曾天宇还参加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江西支部的活动(陈立明,1990a:77;彭湃研究史料编辑组,1981:368)。曾天宇在日本的留学经历虽然短暂,但他在这里既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激发了反帝的思想,与彭湃的结识对他后来从事农民运动也有重要影响。

1918年,曾天宇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的预科法科班(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1923:46)。北平中国大学由宋教仁创立于1911年,校董彭允彝、姚憾、欧阳振声等均为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同盟会员。中国大学自开办起,就带有浓厚的国民党色彩,并与军阀的管制极力抗衡(北平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筹备会,1929:1—3)。曾天宇入学的次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中国大学时任校长姚憾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国大学的学生积极参与罢课等抗议活动(北平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筹备会,1929:10—12)。曾天宇在北京期间,也受到了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思想的影响。曾天宇1922年1月向万安友人提出仿照《新青年》创办万安《青年》杂志,得到积极响应(何隆亮,1992:22)。1924年,曾天宇给陈独秀写了一封辛辣抨击军阀曹锟的信,刊登在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上(曾南挽,1924)。⁶曾天宇在北京期间还参加了“赣人治赣”运动,被江西旅京同乡会推举为向总统府请愿的代表。⁷

正是带着反帝反军阀的理想,曾天宇选择了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冬,他在北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谢一伟等,1981:129)。不过,当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相当涣散,⁸而中国大学在北京当时的

6. 曾南挽为曾天宇的笔名。

7. 《旅京赣人进行撤威运动》,载《申报》1921年1月20日第7版。

8. 北京青年团组织甚至因此在1924年被团中央公开解散,重新组建。参见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1991:85—86,107—113。

学生运动中又比较边缘,所以,曾天宇在北京期间并未经历严格的党团组织训练。

1924年6月曾天宇大学毕业回到江西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坚定的反帝反军阀思想、富于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人。不过,他在南昌的革命活动主要以国民党组织系统为依托。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一大,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人赵醒侬、邓鹤鸣被国民党中央委派为江西国民党的筹备员,他们同时还肩负着建立江西共产党组织的重任(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6:4;中共中央组织部等,2000a:452)。赵醒侬出席国民党一大时与同为江西代表的萧炳章结识,后经萧炳章的介绍,结识了曾振五,得知了曾天宇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编写组,1994:35)。因此,曾天宇还在北京读书时,就已被赵醒侬列名为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的7名筹备委员之一。⁹曾天宇一回到南昌,就以个人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并充分利用他在江西上层人士中的社会关系,在南昌开办了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明星书社的开办经费同时得到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资助,由曾天宇任书社经理(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编写组,1994:35—36)。黎明中学以吉安府所辖各县人士(时称“吉安十属”)的名义创办,由曾任江西省议会会长的龙钦海任名誉校长,曾天宇为校务主任。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成为江西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据点(刘其农,1981:99—104;王康,1981:105—113;许秉钧,1985:15—16;江西省政府统计室,1936:112)。江西国民党“一大”和“二大”即在黎明中学召开,曾天宇连任两届省监察委员(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6:91—92)。

与曾天宇在江西国民党系统的核心地位相比,他在江西共产党系统的位置则比较边缘。按照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的规定,曾天宇到南昌时已经超龄,是所谓的“特别团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377)。所以,他不会参加南昌的青年团组织活动。1925年11月,曾天宇致信曾与他在心远中学同学的张国焘,请他给赵醒侬等南昌党组织负责人去信,介绍自己加入中共。由于信件往来所需的时间等因素,曾天宇可能迟至1926年2月才加入中共(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1990:80;陈立明,1988a:244—246)。入党后,曾天宇一直奔走于江西

9. 参见江西省政府统计室,1936:111。该史料中提及的“曾国香”即曾天宇的原名。

各地,穿梭在国共两党之间。曾天宇的这些经历使他的中共党组织观念一直比较淡薄。这一点对他在后来万安暴动中的表现有着直接的影响。

四、万安农民运动、族群冲突与势力范围的划分

(一) 万安农民运动的前奏

1926年6月前,万安县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活动以宣传革命思想为主。曾天宇虽然这时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但他却是万安县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引路人。

前文曾提及1922年1月曾天宇给万安友人写信,这个友人名叫张世熙。张世熙1894年出生于万安县窑头乡中塘村一个私塾教师的家庭。他先后在南昌二中和饶州工业学校就读,期间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熏陶。曾天宇来信时,张世熙正在万安县立高等小学任教。这个职位非常便于他开展组织工作。于是,张世熙邀集了严安华、萧冠宇、曾宏毅、王立生和许大权等人,在1922年曾天宇寒假回家时,成立了“万安青年学会”。这个学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具有相似求学经历和思想经历的新学生。该学会成立后即在县城、罗塘、窑头和上宏等地组织平民夜校和娱乐部,开展新思想的启蒙工作。1925年5月,曾天宇又帮助张世熙等人在万安创建聚华书店,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1926年春,曾天宇、肖素民介绍张世熙加入了中共(陈立明,1990a:78;陈立明,1990b:113—116)。

可以看到,万安县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组织有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曾天宇和张世熙。曾天宇常年在外,是万安革命运动的灵魂人物。而张世熙则从县立高小任教起就一直在万安工作,后来又先后担任县教育局局长和建设局长。1925年2月国民党万安县党部成立时,张世熙任常委,成为万安国民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立明,1990b:115)。1926年7月,万安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万安支部干事会成立时,张世熙任书记(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1999:37)。张世熙可说是万安革命运动的具体领导者。无论是从革命资历来说,还是从革命资源和社会影响来说,曾天宇都要远高于张世熙。在万安农民运动兴起之前,曾天宇和张世熙在开展革命的宣传上完全志同道合,而在万安农民运动兴起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他们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张力。

（二）万安农民运动的兴起

江西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省党部的推动下开展起来的。1926年6月,即国民党决定开始北伐的前一个月,中共江西地委按照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与共青团南昌地委两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该年暑假派在南昌工作和学习的60余名党团员回本县,发展共产党、共青团、国民党及农民协会各组织(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a:519—520),由此掀起了江西农运的高潮。

万安农运的发展态势也大体如此。它在全省属于农运发展较早的县,1925年2月即已成立县农协(钟汉华,1984:32)。农运高潮的到来为万安县的革命局面带来了新的变化。到1926年10月,万安县已经成立了3个区农协、10个乡农协(振农,1993:118)。这3个区农协分别是罗塘、上宏和窑头(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14),它们也是后来发动万安暴动的三支主要武装力量的基础。因此,我们分别作一简要分析(见图1)。



图1:民国时期江西省万安县行政区划示意图¹⁰

10. 本图系结合《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乡(镇)分布地图集》(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等,1991)中的万安县地图、遂川县地图、泰和县地图绘制而成。

1. 罗塘农运

罗塘区以及整个万安县农运的灵魂人物是曾天宇。和那个时代大多数返乡组织革命的知识青年一样，曾天宇组织农运的主要资源来自传统社会的资源：亲缘、学缘和地缘。

就亲缘来说，曾天宇充分发动了老家村背村的曾氏家族成员参加革命。在万安暴动前后，这个村的革命烈士占了全村人口的 1/8 左右（曾王鼎，1996：3—6）。

就学缘来说，曾天宇利用他的影响，以万安县立高等小学和罗塘至善小学为基地，将在此工作的文章（罗塘浇田村人）、刘冰清（罗塘双龙村人）、刘光万（罗塘双龙村人）、许大权（潞田乡高坑村人）、郭定元（高陂乡符竹村人）等紧紧团结在一起，并通过他们将万安赣江西岸的农民充分地发动起来。无论是万安县农协委员长刘光万，还是罗塘区农协负责人刘冰清，都是由曾天宇发展入党的（何隆亮，1992：23—25；杨志荣，1990：5、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02：151；刘明生，2010：217、219、224）。

就地缘来说，罗塘农运的兴起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土客冲突的背景。万安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罗塘是土著聚居地。但罗塘位于遂川江与赣江的汇流处，是赣江西岸的重要圩镇和交通要道。而遂川县则是一个土客冲突历来比较激烈的地方（万芳珍，1985：54—55）。遂川县山多田少，林业发达，木材出口是该县的经济支柱（遂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1—2），因此，对流经县境的河流的控制权至关重要。其中遂川江的水路最为重要，该水系发源于遂川西南，分左、右二溪在遂川县城汇流，而后一直延伸到万安罗塘。遂川县城和遂川江下游是土著聚居地，而右溪河为客家聚居地，左溪河则为土客混居的地方。民国以来，遂川因为萧家壁的出现而使早已存在的土客之争更加激烈。萧家壁是遂川大坑乡人。大坑位于右溪河下游，萧氏是当地非常有势力的家族。萧家壁生性好斗，在南昌读书时就曾挑起土客纠纷（钟海东，1989：58）。他回到大坑后，不仅成为当地的客籍人首领，1925 年还在遂川县城建立了木行商号，将其影响扩大到县城（王才友，2011：138）。此外，尽管遂川江下游地区多为土籍绅士所控制，但邻近万安县的碧州乡却是一个客籍较集中的地方（遂川县地名志委员会办

公室,1987:108)。因此,遂川的土客之争延伸到了罗塘,在木竹等产业上面临客籍势力威胁的罗塘人需要通过农协积极地武装起来。这个背景到1927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得更加突出。

由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来说是一种崭新的革命运动。但这种新的革命运动并不会将传统社会既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冲突因素割裂开来,反而是以这种社会网络为组织基础,并将传统的社会冲突裹挟了进来。但曾天宇与万安其他农运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与万安以外的革命世界有着广泛的接触,因此,在农运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识。1926年春,曾天宇在广州活动,并介绍万安人萧秉国进广州农讲所(郭青,2003:14—15)。这表明曾天宇此时很可能与他在日本的旧日相识,曾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秘书、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农民部长的彭湃有过接触,并从这位“农民大王”身上学习了农运的经验。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命曾天宇为特派员,主持万安的农运工作。¹¹国民党中央的这个任命也可能与彭湃的推荐有关。1926年8月后,曾天宇还受委派到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工作(陈立明,1990a:83—84),对当时作为国民革命中心的广东的农运有了更多的体会。1927年初,曾天宇在朱德创办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政治教官时,根据朱德的指示,带学员到万安等地训练农运骨干(赵镛,1958:57)。4月,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再度掌握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后,曾天宇被委任为省党部和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到赣东北多个县市指导农运工作(陈立明,1990a:84—86)。这些经历都铸就了曾天宇回乡领导农运的独到眼光。

2. 上宏农运

上宏农运的主要领导者是上宏人刘兴汉。刘兴汉发展农运也主要是依靠学缘和地缘等传统社会关系。上宏农运的基地是上宏自强小学。刘兴汉的革命引路人是万安高陂人郭化非。郭化非早年曾在上宏自强小学任教,后来成为中共吉安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刘兴汉1925年7月从吉安吉州中学毕业后,回到万安任上宏自强小学校长。郭化非、刘兴汉等人在上宏自强小学组织了革命组织“前进社”(梁鼎新,

11. 参见五部档:《中央农民部委任曾天宇为本部特派员》(1926年4月26日),台北:党史馆档案,档号2438。转引自王才友,2011:30。

1988:94;王阿寿,1992:428—429)。11月,郭化非介绍刘兴汉入团。12月,刘兴汉在上宏自强小学成立了团吉安支部第五小组(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a:274、290)。1926年春,刘兴汉由团员转为党员(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等,1990:10)。7月,万安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万安支部干事会在上宏自强小学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1999:37)。吉安党组织后来又派共产党员彭令到该小学任教(何隆亮,1992:25)。正因为有这样的组织基础,上宏成立了区农协,刘兴汉任委员长。

上宏农运兴起的地缘因素与罗塘非常相似。遂川县除遂川江外,另一条主要的河流是蜀水。蜀水在遂川北部分左、右两江,到双桥汇流后,经过上宏乡,到泰和县蜀口洲入赣江(遂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111)。遂川北部是萧家壁和另一个客家首领李士连的势力范围。在蜀水万安县西北境内与上宏乡紧邻的高陂乡是一个土客混居的地区。高陂乡最大的豪强郭明达虽然是土籍,但他与当地农会发生冲突后,投靠了李士连,依靠客籍势力大肆屠杀本籍人士(梅建树,1984:53—54)。而蜀水向东过了高陂乡后,经上宏到蜀口洲一直到泰和县城,都是土著聚居地(泰和县地名志委员会办公室,1986:7、226、329)。因此,在上宏、高陂地区,土客之争表现得相当激烈。1927年夏,蜀水涨水,大批木材漂流而下,先是土籍民众与遂川客家木商发生冲突,而后客家木商请来了李士连的客家武装,而刘兴汉则组织上宏与泰和的农会会员与之对抗。双方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直到客家一方落败。后来,李士连又乘“清党”之机带人烧了自强小学和刘兴汉等人的房屋(泰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827;钟汉华,1984:34;何隆亮,1992:25)。

3. 窑头农运

窑头农运的主要领导者是张世熙。1926年2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决定在赣江流域、鄱阳湖沿岸和南浔路一带有重点地开展农运工作(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6:247)。作为国民党万安县党部主要负责人的张世熙,也是全县农运的负责人之一。不过,张世熙开展农运的主要基础在他的家乡——窑头。窑头农运的兴起同样依靠的是传统的社会关系,但与罗塘和上宏不同的是,窑头农运与传统的宗族矛盾纠

缠在一起。

当时窑头地区设置有两个乡：窑头乡和剡溪乡。窑头场镇是赣江东岸的重要圩镇，为鄢氏宗族所占据。但场镇周边大多非鄢姓村，因此，鄢氏宗族占地较窄（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7：37—39）。民国以来，天主教在万安赣江两岸有了较快发展。鄢氏宗族便想借建教堂之机在窑头强占民田，遭到了其他宗族的强烈反对，而鄢氏宗族常常借机对其他宗族的民众进行压迫（郭敬华，2001：23、25；张世熙，1988b：63；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853）。剡溪位于贯通窑头地区的通津河岸边，是匡氏宗族的聚居地，历代仕宦力量较强，当时以剡溪第三启明小学为政治活动的据点（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7：46—47；郭敬华，2001：26）。而以窑头第一启明小学为据点，兴起了三个与鄢氏、匡氏对抗的宗族。

第一个是窑头乡中塘村张氏宗族。这个村出了许多著名的革命者，包括张世熙、张一道、张世纲、张世瞻以及窑头区农协主席张世哲。参加革命的张氏宗族当然并不限于中塘村，而是遍及全乡（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7：38—39、44；刘明生，2010：222—223；彭令，1988：107；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47）。第二个是广布于万安北部和东部的萧氏宗族。我们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元老萧炳章是剡溪乡楼下村人，他思想左倾，在当地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窑头地区和紧邻的石塘乡先后创办了三所小学，即窑头第一启明小学、焦源第二启明小学、剡溪第三启明小学。尽管剡溪第三启明小学后来成了反动势力的据点，但窑头第一启明小学和焦源第二启明小学都是革命据点（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7：47；童扬藩，1986：65；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68）。受其影响，萧氏宗族也多有参加农会。第三个是窑头乡和剡溪乡八斗村的刘氏宗族。后来担任窑头区委书记的刘黎和万安农民自卫军军事教官的刘冠三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7：42—43；刘明生，2010：218—219）。

尽管窑头农运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严格按照宗族冲突来划线的，但至少农运最初的动员中，宗族冲突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也为研究赣东北和赣南农民暴动的学者所佐证（陈德军，2004：80—87；许金华，2013：307—312）。

万安农运发展迅猛,到1926年底,已成立了6个区农会,300多个乡村农会,会员达到49500多人(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554,559)。1927年2月召开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时,万安县参会的代表有7人之多,是各县代表人数最多的(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农业大学,1993:83)。

(三) 万安农民武装的发展与革命势力的划分

随着万安农运的发展,万安农民自卫军成立。这是县一级的农民武装,是县内最强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从成立后经历了控制权的转变。

1926年10月10日,万安召开了庆祝北伐胜利大会。次日,又由曾天宇和张世熙主持召开党员大会,会上决定成立万安农民自卫军,并以区为单位建立兵工厂、硝磺厂,制造武器弹药。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农民自卫军于1927年2月正式组建。兵源从万安县各区的农协中选拔,共计40多名队员(彭令,1988,109—110)。从自卫军成立的各项安排上,可以看到万安最早成立的三个区农协的影响。

成立自卫军由曾天宇提议(何隆亮,1988:6),自卫军成立地点及驻地在曾天宇的家乡罗塘,自卫军的伙食由罗塘区农协负责供给(彭令,1988:110),这些都表明了曾天宇及罗塘区农协对自卫军的重要影响力。自卫军的队长由上宏自强小学教师刘澄清担任,这是刘兴汉领导的上宏农运力量的体现。而自卫军政治指导员由窑头乡中塘村人张松游担任,军事教官由窑头乡八斗村人刘冠三担任(彭令,1988:110;刘明生,2010:219,224)。在自卫军三名领导成员中,窑头人占了2/3的比重,这表明了张世熙及其窑头农协的影响力。

可以说,自卫军在成立之初,上宏、罗塘、窑头这三区势力对自卫军的控制力是三足鼎立的。自卫军成立的地点虽然在曾天宇的家乡罗塘,但曾天宇这个时期并不常在万安,因此,他对万安农民自卫军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提供驻军地点和费用上,并无暇顾及自卫军的具体事务。张世熙的影响力主要在其家乡赣江以东的窑头一带,对于驻地在赣江以西的自卫军,控制力比较受限。刘兴汉所在的上宏位于万安县边缘,且他的资历与威信又不如曾天宇、张世熙,因此也不大可能掌控整个农民自卫军。

1927年6月初,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公开反共,“礼送”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出境。曾天宇以国民党江西教育厅督学(萧炳章时任省教育厅长)的公开身份、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的秘密身份回到万安(陈立明,1990a:86;王宇仁,1988:114),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万安的工作中,而罗塘紧邻的遂川县的形势变化促使曾天宇对万安农民自卫军的控制和壮大分外重视。

遂川县的早期革命者如陈正人、王次楩等绝大多数都是土籍出身。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遂川县城后,陈正人组织了中共遂川特别支部,并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指导员的身份掌控了国民党县党部,并开展了激烈的工运和农运,引发了原来控制县城的罗普权等土籍士绅的不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土籍退役军人李用周、罗晓岚等组织了地方武装组织——“军界偕行社”,对抗共产党组织(李先荏,1991:98—99)。这本是在土籍人中展开的斗争,但萧家璧随即卷入了这场斗争。1927年4月,时任遂川县政府财粮科科长的萧家璧扣发了国民党县党部的经费。5月,萧家璧去南昌时,王次楩等人以“窝藏枪支”的罪名向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告状,萧家璧因此被羁押40多天。但遂川的共产党员随后遭到土籍士绅及其武装的清洗,多人被捕,只有陈正人等少数人幸免于难(王才友,2011:138;陈宗文,2007:20)。陈正人与万安有着较深的渊源。他出生在遂川东乡大屋场,距罗塘不远;他在吉安读书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的是万安人罗醒,介绍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两人中也有一位是万安人郭化非;1925年秋冬,他在吉安遭到通缉时被吉安党组织派到上宏自强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参加万安的革命工作(陈正人,2009:411—415)。因此,陈正人在遂川遭遇事变后很自然地和王次楩等人转移到罗塘。陈正人等人急迫地需要借助万安农民自卫军的力量救出遂川的被捕同志,遂川土籍的士绅势力对陈正人等人也不会善罢甘休,而生性逞强好斗的萧家璧一旦出狱,势必会对陈正人等人进行疯狂的报复。曾天宇既然接纳了陈正人等人的避难,也就把遂川县的这些矛盾焦点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而无论是要救人,还是要抵抗萧家璧和罗普权的土客籍势力,都必须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并牢牢地掌握它。

为此,曾天宇开始寻找各种途径收集枪支,整合部队。因为陈正人

与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是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同学，曾天宇就在1927年6月下旬派陈正人去吉安总工会借了11条枪。¹²又因为陈正人与吉安党组织联系紧密，并且陈正人在上宏自强小学任教时与刘兴汉同属“前进社”的成员，所以，曾天宇通过陈正人拉近了与刘兴汉的关系。而且，上宏也和罗塘一样面临以萧家璧为首的客籍势力的威胁。所以，两地结成了同盟。在曾天宇7月28日组织的攻打遂川城的战斗中，其战斗成员就包括了吉安总工会派来支援的10名射击手，上宏调来的20人以及罗塘的40人（钟汉华，1984：34—35）。此前，曾在贺龙部队任过团长的杨德明率领30多人和11条枪，从福建来到罗塘。曾天宇派人接待了他们，并收编了这支武装（许大权，1988a：116）。后来，杨德明接替刘澄清，担任自卫军队长（遂川县委党史办，1988：118）。无论从攻打遂川的人员组成看，还是从自卫军队长人选的变动看，都可以发现此时万安自卫军已经完全由曾天宇控制，并以罗塘成员为其主要成分。7月到8月，曾天宇带领自卫军与遂川“军界偕行社”及萧家璧的客家势力先后展开了三次战斗，¹³基本达到了救人、抢枪和自卫的目标。曾天宇刚回万安时就用教育厅督学的工资买了长枪、短枪十多支（王宇仁，1988：114），而在与遂川反动势力进行三次较量后，曾天宇又先后五次带人从国民党逃兵处缴获枪支，收集到30多条枪，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许诗蕊，2001：14—15）。

在曾天宇凭借其革命威信及多方努力获得万安农民自卫军的控制权的同时，万安其他几个乡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和武装力量。比如，窑头区农协就在5月份建立了兵工厂、硝磺厂，铸造出了梭镖1000多支、鸟枪400多支（彭令，1988：111）。窑头积极武装本地农军，既有本文前述的宗族冲突的因素，同时，随着万安农民自卫军逐渐成为

12. 许大权在回忆中把陈正人借枪的对象误为梁明哲。陈正人、梁明哲、梁一清都是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同学，但当时，担任吉安总工会委员长的是梁一清，而非梁明哲。梁一清的总工会纠察队之所以有枪，是从国民党新编第二师手中夺来的。参见许大权，1988a：11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9：47。

13. 1927年8月，遂川县成立了保卫团，由县长李焜任总团长，土著人罗普权和刚刚出狱的客家人萧家璧分任三四区团和一二区团的团长，共同负责清党。后人一般将此称为遂川县的“土客平分军权”。但萧家璧手下有枪200支，而罗普权手下有枪150支，萧家璧后来又兼任总团长，所以，客家的势力还是稍大。参见遂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343；王才友，2011：139。

曾天宇领导的武装,曾担任自卫军军事教官的窑头人刘冠三回到了家乡,另行组织武装。10月下旬,刘冠三在剡溪领导当地几千名农民,与石塘的农军联合进行了一场针对匡氏宗族的暴动,捣毁了匡庐等人控制的剡溪第三启明小学,营救出第一启明小学教师萧春,并没收了匡庐等人的财产(郭敬华,2001:26—27;戴向青,1988:218—219)。

除前述的罗塘、窑头和上宏这三个地区外,还有两个地区也发展起了武装力量。一个是与窑头紧邻的石塘地区。这个地区最主要的武装领导来自石塘乡蓝田村的萧氏宗族,包括萧子龙、萧玉成、萧汝昌等(刘明生,2010:220—221)。蓝田萧氏与窑头、剡溪的萧氏以及紧邻的泰和县冠朝乡雷塘村的萧氏均为同宗(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7:47、73;泰和县地名志委员会办公室,1986:251)。而泰和县农民自卫军的领袖萧拔群就是雷塘村人(泰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824)。因此,以蓝田萧氏为领导核心的农军与窑头地区及泰和县的农军常常协同作战(郑云彪,1985:23)。这支农军因为以石塘乡的茅坪村为革命基地并在此建立中共区委,所以,后来也被称为茅坪农军。这支农军后来可能还获得过正式的番号: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王健英,1994:104;刘明生,2010:220)。

另一支力量来自位于万安南部的良口地区,其党组织的创始人是朱曦东。朱曦东早年在南昌读书,并在曾天宇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9月后回到家乡,以教书为名开展革命活动,并逐渐发展出一支农军力量(赣县县委党史办,2011:34)。

以上这五个地区,正是到1927年10月为止万安县委建立的五个区委的所在地。在这五个区委中,位于万安西部、赣江以西的罗塘与上宏这两区都把曾天宇拥戴为领导核心。这是因为,上宏区的地理位置较为边缘,与罗塘同在赣江以西,同样面临来自遂川客家势力的威胁,且通过陈正人,在上宏革命领导人刘光万与曾天宇之间建立起了纽带,所以两区共同认同曾天宇的权威。而窑头、茅坪这两区都位于赣江以东,与罗塘之间相隔赣江,农运所激发的社会冲突与赣江西岸的情况不同,其武装也与万安西部的武装分头发展。虽然窑头区的领导人张世熙是在曾天宇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但张世熙在万安国共两党和农运中有着较高地位,且他所在的窑头地区又是万安县的产粮区(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199),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展和教育水

平都较高,革命基础非常好(郭敬华,2001:23—27),因此,张世熙在万安自成一个势力范围。以上这四区都在万安北部。而良口区在万安最南端,与北部区域相隔较远,可视第三个势力范围。良口与相邻的赣县革命力量有着更紧密的合作,¹⁴而与万安的革命力量合作较为疏远,但由于其主要领导人朱曦东个人是在曾天宇引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对曾天宇的权威也比较认同。

就武装力量而言,曾天宇能控制的武装力量要远远强于张世熙能控制的武装力量。首先,曾天宇领导的自卫军拥有数十支长短枪,甚至还有钢炮。这些在当时的战争中非常重要的武器都是万安其他各区所没有的(许诗蕊,2001:15;康克清,1988:151;钟汉华,1984:37)。窑头兵工厂能够制造的只是土枪土炮,在威力上远远落后于步枪。其次,曾天宇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武装领袖,从收集武器到壮大队伍,都是亲自上阵指挥;而张世熙所影响的地方武装虽然有几支队伍,但张世熙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其中,尤其是茅坪地区的农军不是他所能直接掌控的。这些因素使曾天宇掌握的军事资源远胜过张世熙。

五、万安暴动:“糜烂地方”之忧,抑或“扭曲革命”之忧?

从前文勾勒的万安大革命史可以看出,万安最重要的革命领导人还是曾天宇。在万安革命者的心中,共产党的形象不是抽象的,而是人格化在曾天宇这样的人物中。用他的一位追随者的话来说,“他是江西的开天辟地人,赣西一带的工作完全是他来开展的”(许大权,1988b:136)。曾天宇不仅有实力、有资源、有人脉,而且有较远的革命理想、较高的革命境界和较广的革命见识。当革命激化了既有的社会冲突时,曾天宇并不会像有些学者笔下的地方精英那样,迎合这种冲突,力求提高本族群在地方的利益和势力(陈耀煌,2002),而是会尽力协调各方力量,控制可能激化的地方矛盾,不使革命偏离最根本的目标。当然,随着“八七”会议后中央关于组织地方暴动的指示的传达,随着革命领导人内部分歧的出现,会使曾天宇的革命理想实现起来更加艰难。不过,曾天宇这种为理想而做出的努力又因为他所具有的较强实力和较弱的组织观念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14. 因此,朱曦东的事迹收在了赣县革命史中。参见赣县县委党史办,2011:34。

江西省委在1927年9月初得到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在9月11日拟定了《秋收暴动的计划》和《秋收暴动煽动大纲》(中共中央组织部等,2000b:1295;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7)。9月中旬,曾天宇派朱景云到南昌,恢复了与省委一度被中断的联系,从而得知了省委举行暴动的计划(陈立明,1988b)。曾天宇随即在罗塘至善小学举行了全县党的代表会议,对暴动问题进行讨论(陈立明,1990a:87)。10月,在省委将万安确定为赣西暴动的起点后,省委代表汪群在曾天宇家中召开了一次吉安、万安等各县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成立了指导赣西秋暴工作的行动委员会,由曾天宇任行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7:43;曾王鼎,2007:32)。此后不久,又在曾天宇的家中召开了万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宣布了行动委员会的名单,决定由曾天宇、张世熙和肖素民3人组成军事参谋部,作为指挥万安暴动的军事机关。同时,又在行动委员会下将万安各区乡的农军组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城区、一区(包括焦源、剡溪、窑头)农协会员组成,张世熙为总指挥;第二纵队由韶口、高陂、白土、上宏等地的农协会员组成,刘兴汉为总指挥;第三纵队由百嘉、罗塘、潞田的农协会员组成,刘光万为总指挥(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47;许大权,1988b:135;罗友林,1988:142—143)。农军三路纵队的划分,明显是按照农协的势力范围划分的。第二路和第三路农军与上宏和罗塘两区农协力量大体对应,而第一路农军,则因为窑头农协和茅坪农协素来的密切关系而并成一路。因距离较远,良口的农军没有参加前几次的攻城。11月10日,万安农民自卫军被赣西特委授予正式的番号——赣西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曾伟国、曾王鼎,2006:2)。纵队有60人,41支枪,队长杨德明,党代表陈正人(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47—48;张世熙,1988b:66)。这是江西最早建立的具有常备军性质的赤色武装,也是由曾天宇直接控制的精锐武装。

那么,曾天宇在掌握了万安暴动的指挥权和精锐武装后,他是如何执行上级的暴动指令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江西省委的有关指令。江西省委在1927年9月制订的“秋收暴动计划”中把各县分成三类——农军势力统治的县、农军有相当力量的县、农运略有基础或有会匪的县。省委对这三类县给出的暴动任务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由于省委对万安的情况不太了解,所

以认为赣西暴动的起点应在永新,而万安只被列入“农运略有基础或有会匪的县”(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23)。但到了10月,江西省委在暴动计划中已经将赣西暴动的起点更改为万安。¹⁵长江局在10月17日甚至指示江西省委“应即搬到吉安或万安去”(罗亦农,1999:310)。所以,在这个新的暴动计划中,万安已被当作“农军势力统治的县”。而对于这类县,省委的指令是:“应即马上实行捕杀豪绅及反动派,没收大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占据财政及交通机关,无限制的扩充兵力,解除反动武装……影响邻近各县以至全省,与湘鄂邻近各县暴动势力联合”(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23)。简言之,省委要求万安尽快捕杀豪绅,攻占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并带动赣西各县。

面对省委的这些指令,曾天宇和张世熙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首先是在万安农村对豪绅进行的烧杀行动。在赣西特委代表曾延生的督促下,张世熙的行动表现得较为积极:他领导第一区即窑头一带的农民围杀鄢根里、陈修唐等6名豪绅,捣毁其房屋,还到百嘉没收了土豪开设的“益丰行”的所有财产(张世熙,1988a:55;张世熙,1988b:66;万安县委党史办,1988:4)。而曾天宇所在的罗塘地区则只进行了办农民夜校、减租退押、严禁赌博和吸鸦片等活动,对违禁者也只是戴高帽、坐禁闭,未曾杀过豪绅。而且,曾天宇对曾延生和张世熙他们领导的烧杀行动还进行了阻止。曾天宇在1927年10—11月间甚至可能召集三区代表会议,改组了万安县委(张世熙,1988b:66;万安县委党史办,1988:4;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10;王阿寿,2008:3)。关于县委的这次改组详情,目前缺乏史料。但这次改组的原因很可能与曾天宇不满张世熙所领导的农协的过激行为有关。在进攻县城的问题上,张世熙与曾天宇的态度也明显不同。张世熙对暴动中的“等待主义”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绝对不能因暴动要准备来限制暴动政策”(张世熙,1988a:59);而在曾天宇看来,即使有实力进攻县城,现在也无甚必要,

15. 省委将赣西暴动的起点改为万安的原因可能与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时任吉安县委书记的张一道,万安窑头乡中塘村人,他对万安情况非常熟悉,在此期间曾给省委写信汇报万安农运的情况。另一个是时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的陈潭秋。10月初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去武汉长江局汇报工作,省委由陈潭秋主持工作。陈潭秋写了一份关于万安农运基础的报告,并决定将赣西暴动的中心从永新改为万安。参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53;曾玉鼎,2007:30。

甚至会带来“糜烂地方”的危险(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11)。

那么,曾天宇为什么不按照省委的指令积极地攻城建政、捕杀豪绅呢?所谓“糜烂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若我们对史料仔细加以爬梳,可以看到曾天宇在暴动初期在控制地方冲突、整合革命力量上的苦心孤诣。

(一) 土客冲突与土客联盟

万安县城是一个土籍人士聚集地(耿艳鹏,2005:229—230),而紧邻的遂川县一直有一支由凶悍的客家人萧家璧掌握的靖卫团武装,连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1927年10月都曾遭到他们的袭击(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223)。当然,遂川县的地方武装并不完全是由萧家璧控制的,尤其是在县城附近更多由土籍人罗普权控制。但是,由于土客在遂川的历史上积怨甚深,而且,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更多在客家控制的山区而非土籍控制的县城活动,造成萧家璧与共产党武装更深的对立。这些积怨和对立又会延伸成遂川客家势力与万安赣江西岸土籍势力的对峙。从1927年8月起,包括萧家璧在内的遂川豪绅在万安的财产被没收,遂川通往赣江的通道被封锁(张世熙,1988b:64)。所以,如果曾天宇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组织攻打万安县城,势必会造成土籍势力的内乱,如果萧家璧乘虚来攻,则如同腹背受敌。¹⁶

那么,从上面所述来看,曾天宇的不愿攻城岂不是站在土籍势力一边,强化土客的界限?其实,曾天宇作为万安最有实力的革命者,对万安局势的稳定有着通盘的考虑,所以他不愿意给遂川客家势力以可乘之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曾天宇就着意强化土客之争。事实上,为了促进革命,曾天宇也特别留意促进土客的联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天宇与许大权的关系。

土客关系在传统社会就表现得十分复杂,既有尖锐对立和冲突的一面,也有相互依赖的一面。聚居山区的客籍群体掌握着木料、茶油等山货,而土籍人手上有客籍人所需要的粮食。不仅土客之间存在着货物上的相互需求,而且在技艺上也可能存在着互补关系:土籍人常常向

16. 曾天宇领导的武装与萧家璧领导的武装在1927年8月上旬展开的第三次较量就是萧家璧主动进攻万安。而1927年12月,万安、遂川和泰和三县靖卫团会剿万安的农军时,来罗塘清剿的也正是萧家璧的队伍,他们烧毁了曾天宇在村背村的家(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46—47;杨志荣,1990:4—5)。

客籍人学习拳术武艺,而客家人的子弟又常常需要到土籍人开设的学堂学习。有时,客家中的读书人会应聘到土籍人所办的学堂任教,从而在土客之间形成师生、同学、师兄弟等关系(许庆华等,2004:62)。

许大权的成长经历正是土客结盟的见证。许大权是潞田高坑的客家人,1922年从南昌一中毕业后就到了土著人掌握的罗塘至善小学任教(南昌一中百年校庆办公室,2001)。¹⁷曾天宇很早就把许大权当作自己最重要的革命同盟者。1922年1月曾天宇组建“万安青年学会”,许大权名列其中。1924年9月许大权受罗塘群众推举到南昌控告县长狄祖年及驻军乱收税,就住在曾天宇的哥哥曾振五家,随即协助曾天宇在南昌筹建明星书社、黎明中学。许大权1926年入党后又曾在曾天宇任支部书记的党支部里工作,后来回到罗塘,任国民党罗塘区党部常委、中共罗塘区委书记。曾天宇1927年6月回到万安后,罗塘至善小学一直是他开展革命活动的大本营,而许大权则是他最信任的秘书长。行动委员会成立时,许大权任秘书。暴动成功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时,许大权任主任秘书。¹⁸从这些可以看出,在曾天宇心中,完全没有土客的畛域之见,他反倒是在有意识地促进土客联盟。

(二) 作为地主的宗族与作为革命同盟者的宗族

如前所述,无论是农民运动还是阶级暴动,贯穿其间的常常并不是后来被意识形态化的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宗族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在万安赣江东岸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宗族冲突以革命的名义变得尖

17. 目前史料中并无许大权籍贯的确切信息,但根据《许氏家史资料简编》(万安许氏,1993),万安许氏绝大多数分布在万安县南部,在北部的主要集中在潞田乡高坑村、百嘉乡塘上村以及万安县城。高坑村是客家聚居村,而塘上村和万安县城都是土著聚居地,但许大权更可能是潞田客家人。这是因为百嘉与罗塘相隔赣江,又是万安经济和教育较为发达的地方,如果许大权是百嘉人,那他从小从南昌读书回来后就应该回到老家任教,而不是跑到赣江对岸的罗塘去;而县城的许氏是县城第二大氏族(参见耿艳鹏,2005:245-246),如果许大权出自县城的这许氏望族的话,那么,他在外读书后应该到县立高小任教。因此,许大权中学毕业后到罗塘至善小学任教的合理解释是:他是潞田高坑人,而潞田在万安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都较低,所以,许大权毕业后选择到离家很近、同在赣江西岸、经济和教育都较发达的罗塘来任教。另外,有一个史料在介绍潞田的圩镇时提到了许大权,也可作为许大权籍贯的一个旁证。参见温发钺,2003:98。

18. 许大权1969年4月23日的回忆,转引自曾王鼎、曾伟国,1988:41。另参见何隆亮,1992:25-27;许大权,1988b:133-136;南昌市委党史办,1986:26;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871。

锐起来时,一个有远见的革命领导者应该尽力控制和弥合这种冲突,将宗族变成革命的助力而非阻力。无论是延缓攻城,还是阻止东岸领导人的烧杀行动,曾天宇都有这样的考虑。

当时万安县城势力最大的两大氏族是刘姓和许姓。刘氏的产业主要分布在城西、城南和城北,人称“刘家半天下”,而仅次于刘氏的许氏又与刘氏建立了稳固的联姻关系(耿艳鹏,2005:245—246)。因此,对县城南门和西门的进攻主要危及的是刘氏和许氏的产业。然而,刘氏一直是国民革命重要的同盟军,没有刘氏的支持,万安的革命很难得到顺利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大革命时期的诸多县,学校尤其是县立高等小学都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场所(王龙飞,2013;黄文治,2011)。中共中央甚至在1925年还专门作了一个《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明确将乡村学校作为农民运动的着手处(中央档案馆,1989a:541—546)。万安县立高等小学就是万安县革命的策源地,而该校正是由县城最大的氏族刘氏所掌握的。从1914年到1923年,万安县的劝学所所长均由刘氏出任。辛亥革命前后,思想进步的刘振群中学毕业后到万安高小任教。1927年,刘振群正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江苏高安县后担任了代理县长。张世熙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革命组织工作的。1925年国民党万安县党部成立时,书记长由刘姓(刘凯世)出任(刘绍太,1984:27—31;刘文渊,1992:14;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554)。此外,萧氏也是县城的一大宗族,其势力范围主要在县城东门附近(耿艳鹏,2005:246),而前文所说的萧炳章则是万安革命重要的庇护者和支持者。因此,在“八七”会议后盲动主义盛行、烧杀声震天的情况下(李维汉,1986:190、219),让农军肆意捕杀豪绅,攻占万安城,很可能会伤害到像刘氏、许氏和萧氏这样的革命同盟者和庇护者的利益,从而使万安的共产党今后再难借助统一战线去开展工作。

对赣江东岸领导人劫掠烧杀行为的阻止也有这样的考虑。比如,东岸农军对百嘉乡“益丰行”曾进行劫掠。益丰行,在有些文献中写作“益枫堂”,它是用刘氏公田租金建起来的,既是刘氏的商业店铺,也是刘氏的宗祠(郭敬华,2005:304)。对刘氏宗祠的毁弃比对其财产的洗劫要给刘氏带来更大的伤害。

(三) 革命的组织基础与烧杀指令的破坏性

前面我们已经谈及,曾天宇的革命队伍是依靠传统社会的关系资

源建立起来的。在万安,像刘氏这样的大地主大商人其实是很少的,佃农和雇农在农民中也仅占 20%,而半自耕农和自耕农高达 75%,在县城里更多的则是中小商人(张世熙,1988b:65;耿艳鹏,2005:232、240—245)。这些通过亲缘、学缘和地缘团结起来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中小商人本来都是革命队伍的参与者或同情者,而暴动中盛行的烧杀行径¹⁹势必直接危及革命队伍的组织基础。国民党旗帜下组织起来的农协本来是为了瓦解军阀的权力基础,但当农运越来越激进时,不仅会彻底打破地方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将烈火进一步引向革命队伍内部,尤其是当带着仇恨情绪组织暴动时,在地方上更会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1928年1月,万安农军在攻占县城后,不仅大量没收了所谓“官僚资本、土豪劣绅”的财产,还侵犯了一些个体手工业者,连制烟的刨子和打铁的工具都被农军拿走(罗友林,1988:146)。后来,当赣江东岸的农军与良口的农军联合攻打黄塘的地方武装时,就因为农军一路实行烧杀而使黄塘的农民在当地士绅提出的“保护地方”的名义下坚决地站到了农军的对立面(钟汉华,1988:101)。这虽然都是在农军攻占万安县城以后发生的事,但以曾天宇的远见卓识,必然深刻地预见到了攻城与烧杀、烧杀与失去群众基础之间的关联,也必然深刻意识到企图通过烧杀将小资产阶级逼进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行为只会适得其反。

(四) 国共合作的断裂与延续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政权宣布分共后,中国共产党在8月份还认为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到9月份即提出暴动不再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而要开始苏维埃革命(中央档案馆,1989b:335、370)。但这只是中央层面的决策,这种决策到地方上会遇到各种情况,比如,决策无法及时传达到。对曾天宇来说,他很清楚中共已经改旗易帜的问题,因为江西省委在10月8日已经明确提出不再使用国民党的名义,而省委代表汪群10月在曾天宇家里又传达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40;万安县委党史办,1988:6)。那么,曾天宇对中央和省委的这一指示并未认真

19. 当时的政策指令是实行所谓“三杀五抗”(杀土豪、杀劣绅、杀反动派,抗捐、抗租、抗税、抗债和抗粮),以群众的政治力量来杀尽豪绅地主、政府官吏及一切反动派,造成“旧编地的大骚扰”。参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64—165;郑云彪,1985:22—23。

执行,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因为“清党”在万安进行得浮皮潦草。1927年6月25日,清党军的首领、万安人周颂甚至一回到罗塘就被农军处决了,直到7月份,国民党刘士毅率领的一旅部队才占领了万安城,但万安农村基本不曾经历清党(许大权,1988b:134;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8:261—262)。因此,万安大革命时期发展出来的农运力量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曾天宇依然继续沿用国民党农民协会的名义来号召群众(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12)。

其次,曾天宇在国共分家时之所以没有表现得那么决绝,不仅仅是基于万安的情况,也是基于他个人的经历和认识。如前所述,曾天宇在江西国民党的根基很深,而在江西共产党的位置则比较边缘。他当然有着坚定的共产革命信念,但他对国民党左派也有着较深的体认,并没有轻易地放弃把他们当作同盟军。陈耀煌(2002:155—156,188—189)在研究鄂豫皖苏区时也注意到,当地的共产党在组织暴动时仍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作,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共产党被地方精英的利益牵着鼻子走。而我们从曾天宇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参加革命并不是或更主要的不是为了保护或提高他所在的族群的利益。他不执行上级的指令,是因为他对革命有自己的见解。与其说曾天宇担心的是“糜烂地方”,还不如说他担心的是“扭曲革命”。

既然曾天宇并不愿意匆忙攻城,那么,到了11月19日,他为什么又似乎冒冒失失地发起了对万安城的第一次进攻呢?其实,这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1927年9月14日,驻守江西赣州的国民党第14军军长赖世璜因国民党派系斗争在上海被捕(郭廷以,1985:258)。而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派南昌公安局长李思愬去赣州收编第14军驻在赣州的余部。10月,当李思愬从南昌坐轮船经过万安罗塘时,被罗塘农军拦江截击,缴枪四支。11月,将第14军收编完毕后,李思愬由14军的一连武装护送,准备返回南昌。返程中再次路过万安时,决定追究上次在万安被缴械一事。11月19日,李思愬派兵到罗塘至善小学搜查,见小学中布满共产党与青年团的标语、宣言,于是迅速回到万安县城,准备次日早晨返回赣州,搬重兵前来镇压。曾天宇得知消息后,与当时在万安的江西团省委书记吴振鹏共同决定先下手为强,火速布置连夜攻城,后来终因农军势力悬殊而告败(张世熙,1988b:66—67;

钟汉华,1984:37;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200)。

六、上级在万安强化党的组织性的努力及其失败

曾天宇有自己的理想,有雄厚的实力,而素来的组织观念又不强,这造成他在暴动初期指挥一切、自行其是的态势。但上级党组织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长久存在。为此,省委采取了多种措施,企图在万安强化党的组织性。

其实,在省委召集的成立万安行动委员会的会上,就明确了行动委员会归属赣西特委领导(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10;曾伟国、曾王鼎,2006:1)。但是这种领导关系实际上却难以实现。这里有两个因素:首先,特委力量相当薄弱。赣西特委成立后,书记的位置一直空缺,只有曾延生作为特委代表主持工作,特委的工作人员只有曾延生的夫人蒋竞英和袁振亚等几个人(曾伟国、曾王鼎,2006:1),可谓势单力薄,几近于一个空架子。而行动委员会则是兵强马壮,光是委员就有7人之多,连中共长江局代表余球和江西省委代表汪群都在里面,²⁰而且还下设有军事参谋部和3个农军纵队。其次,赣西特委的代表曾延生自己只是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也即在曾天宇担任主要领导的机构里担任成员。曾天宇之所以能在如此高规格的机构里担任主要负责人,是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他的家世、威望、资历和资源所致。所以,行动委员会在万安暴动中是一个相当独立的指挥机构,赣西特委实际上对它难以行使领导之权。曾延生10月到11月在万安工作期间,主要是推动张世熙领导的县委“肃清机会主义”,处罚了一批“不积极工作的同志”(张世熙,1988a:55)。而到11月下旬,曾延生就去泰和县开辟新区,建立吉万泰中心联络站(吉安县委党史办,1992:518—519)。因此,赣西特委对行动委员会的工作无力过问。

县委书记张世熙被确定为行动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谋部成员和第一纵队总指挥,这意味着他只是万安暴动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意味着张世熙领导的万安县委在万安暴动中没有决策权,而只有执行权——因此县委对暴动“不曾过问,亦无力过问”(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20. 行动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长江局代表余球、江西省委代表汪群、赣西特委代表曾延生、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万安农协委员长刘光万、万安县委宣传部长陈正人以及曾天宇(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47)。

1986b:110)。当然,真正导致县委无力过问行动委员会决策的,并不是职位的限制,而是张世熙在资历、资源、人脉和威望上完全无法与曾天宇抗衡。

当然,有权管得住曾天宇的还有江西省委。曾天宇对攻城一直不积极,而11月这次的攻城又显得毫无准备,以致无果而终,最终惹恼了省委。11月24日,中共长江局军事特派员、江西省委常委宛希俨来万安召集紧急会议。在会上,宛希俨代表长江局和省委,取消行动委员会,同时将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降为县委委员,任命长江局代表、万安团县委书记、四川人余球代理中共万安县委书记(何隆亮,1991:8;张世熙,1988b:67)。

宛希俨是1927年7月中旬才从湖北调来江西的干部,对万安本地干部的情况知之甚少,也不了解曾天宇在万安的地位。当时的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对江西的干部普遍不满(袁学黄,1934:339—340),所以从湖北等地调了一批干部到江西省委。这些外地干部到江西后,对江西各县的本地干部也不太信任。宛希俨对万安干部的处理方案就是重罚了曾天宇,贬抑了张世熙,将万安县委交给外地干部监管。

曾天宇从来就不曾在赣西特委和万安县委任职。他1927年6月获得的江西省委特派员的身份也应该早随那批湖北干部掌控江西省委而终结。因此,在行动委员会11月24日被取消后,曾天宇在中共组织体制内已经没有任何领导身份了。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曾天宇在万安暴动中的首席领导人地位,万安的精锐武装依然牢牢地掌握在他手中。就在行动委员会被取消的第二天,11月25日,应泰和县委的要求,万安与泰和联合攻打泰和县城的行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万安的百余名农军仍然由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曾天宇率领(施有桢、萧皇才等,1988:127—128;肖锋,1988:120—122)。

对万安城的第二次攻打出现在12月24日。这一次攻城既非曾天宇发起,也非由万安县委发起,而是因窑头区群众对过境敌军的追击而自动发起的(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8:32、42)。攻城群众虽然后来撤围,但要求县委在五天内重新组织攻城(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8:42;肖锋,1988:124)。12月31日,县委为兑现对群众的诺言而匆忙组织了第三次攻城,最后因为未能按时总攻击而再次失败(张世熙,1988b:68)。

对万安城的三次攻打,虽然起因各不相同,但赣江两岸的群众已被动员起来,而上级要求攻城的调子越来越高,²¹继续组织攻城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如何在组织攻城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县城的破坏,这是摆在曾天宇等暴动领导人面前的难题。正在此时,毛泽东来信询问是否需要协助攻打万安城。在曾天宇家里召开的县委会议上,最后决定请毛泽东率兵攻打遂川县城作为配合,并由曾天宇埋伏在遂川到万安的必经之路上伏击从遂川逃出来的敌军,并乘势攻取万安县城。这个计谋既可消除遂川对万安的威胁,又可使万安城不攻自破。1928年1月9日,在遂川县城被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攻占后,从遂川逃往万安的敌工兵连在半路遭到了曾天宇带领的农军的伏击,并被追击到万安城下。万安城的敌人很快弃城而逃,万安遂被农军占领(肖锋,1988:124;罗友林,1988:144—145;许大权,1988b:135—136)。

1928年1月11日在万安县城召开群众庆祝大会,并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曾天宇是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经曾天宇提名、与曾天宇关系密切的罗塘人刘光万,县苏维埃主任秘书也是曾天宇的亲密盟友许大权(陈立明,1988c:179—180;许大权,1988b:136)。

就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对曾天宇的处分决定传到了万安县。中央在了解到万安暴动的有关情况后,于1927年12月13日发布的《江西工作计划》中批评了江西党的工作,认为万安“群众早有充分的力量要起来斗争,而党的负责同志因斗争破坏组织,亦力为遏抑”。该文件中还指出,“过去负工农运动责任的同志,给了群众很坏的影响,党应严重的予以处分,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以挽回党在群众中的信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770—771、774)。中央后来决定给曾天宇留党察看的处分(许大权,1988b:136)。周恩来曾经回忆说,1927年“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周恩来,1980:172)。连身居中央高层的周恩来对这种因为领导暴动失败而受到处分

21. 1927年12月19日,江西省委发布《什么是机会主义与怎样铲除机会主义》,要求万安等地克服不敢主张激烈斗争的机会主义错误(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b:128—130)。12月21日,江西省委发布紧急通告,提出赣西南暴动要以万安为爆点,要求万安尽快攻取县城,使万安、遂川、永新、莲花与宁冈连成一片(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8:29—30)。

的政治纪律都感到很新鲜,更不用说许大权根本就不明白政治纪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作为曾天宇亲密盟友的许大权,最后把处分决定自行扣压了下来(许大权,1988b:136)。1928年1月20日,毛泽东在遂川主持前委与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身无一职的曾天宇仍作为万安县的主要领导人出席(陈正人,1988:90;许大权,1988b:136)。据说曾天宇在得知中央对他的处分后感到“有点丧气”(许大权、胡暨和,1987:284),但由于战事紧张,曾天宇来不及作过多反应。如果时间允许,以曾天宇的性格,²²很可能会向上级提出抗辩的。

1月23日,由于国民党军派重兵围攻万安县城,万安县委决定放弃县城。撤退时,万安县的农军武装分两路撤退,一路由曾天宇带领河西的农军,另一路由张世熙带领河东的农军。3月5日,曾天宇在罗塘被围而牺牲;张世熙回到刻溪一带的山区与敌人周旋了一段时间后,无力继续坚持下去,不得不化装离开了万安(彭令,1988:112;康克清,1988:152;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15)。

七、结论

陈耀煌(2002:82)注意到,大革命时期和苏区初创时期的中共组织远非一个纪律严明、上行下效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组织,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往往远不如对地方精英个人的信仰为深厚”。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着中共早期组织制度的一些重要特征。本文以曾天宇的生活史与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一) 中共组织的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

民主集中制表面上似乎与韦伯定义下的纯粹法理型支配的某些关键特征相扣合,如该支配系统是“以清楚界定的职位等级组织起来”,“每一个职位的权限都有清楚的规定”;“组织的成员之所以服从一个支配者,并非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一个无私的秩序”,即服从于“秩序所给予的、为理性所界定的管辖权”;每一个职位要配有实现该职能的行政工具,官员与行政工具的所有权完全分离(韦伯,2004:309、313)。但

22. 曾天宇当年在省城的革命同事王秋心(1994:184)就说,曾天宇“是个火里炮,对赵(醒侗)有点意见,说他胆子太小,这样也不敢,那样也不敢”。

是，组织成员服从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理性的秩序及依据该秩序所规定的权限，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中共建党、建军初期，权威的现实基础与此相距甚远。权威系统的“人格化”及行政工具的“私人占有性”常常带来组织系统中职位与职权的巨大张力。实际上，不是“职位”赋予当职者权力，而是由当职者的个人资源、资历或威望影响到正式职位的权威性。在万安暴动中，由江西省委指派、归属赣西特委领导的行动委员会是一个权威的决策机构，能够指挥有关暴动的一切工作。但行动委员会的这种权威性，既不是因为授权于省委，也不是因为听命于赣西特委，而是由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曾天宇的个人资源、资历和威望带来的。曾天宇既是江西国民党重建后的元老，又是江西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创建中的重要人物。他既有丰厚的家产，又有广泛的人脉。他既是万安县诸多重要领导人（包括县委书记和县农协委员长）的入党介绍人，又是万安最重要的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后来的赣西工农武装第五纵队）的实际控制者。元老地位、经济资本、人际资源以及军事武装，这些促成了曾天宇在万安暴动中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也由某个职位当职者的个人因素决定了该职位与其他职位之间的关系。行动委员会虽然名义上归赣西特委领导，但赣西特委势单力薄，面对兵强马壮的行动委员会根本无法发挥领导作用。万安暴动虽然发生在万安县，但由于县委书记张世熙是被曾天宇带上革命道路的，而且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万安东北的窑头一带，因此，尽管万安县委与行动委员会的关系没有在组织制度内明确加以规定，但万安县委实际上只是作为行动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执行行动委员会的决策。而共产党领导暴动的行动委员会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农民协会之间本来不应该存在关联，但由于曾天宇个人的革命资源主要来自国民党，他在万安开展农运的基础是国民党的农民协会系统，而万安农村在大革命后又基本未曾经历“清党”，因此，曾天宇就可以同时使用共产党的行动委员会和国民党的农民协会这两面旗帜来进行动员和号令。

（二）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

为了保障上级的指令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中共在“八七”会议后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开始强化政治纪律处分的手段。但无论是上级颁布的指令，还是上级作出的纪律决定，能否得到执行，在中共早期的革命实践中，并不取决于上下级职位的层级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三个因素：上级能否提供相应的资源，上级和下级的资历与威望对比，上级干部与下级干部之间是否存在私人纽带。在万安的事例中，上级的指令不畅和纪律失效也是因为这三个因素。首先，行动委员会虽然是江西省委决定设立的，但省委并不曾给行动委员会提供暴动所需要的任何资源。无论是武器，还是队伍，或是钱财，都得靠曾天宇自行解决，这使曾天宇对省委的依赖性很低。其次，曾天宇在万安县乃至整个江西省都有很高的威望，而万安暴动发生时的省委领导主要是从湖北新调来江西的外地干部，对江西人生地不熟，缺乏威望。再次，曾天宇与省委的这批湖北籍干部之间也不存在诸如血缘、地缘、学缘这类的社会纽带，这使得曾天宇与省委之间缺乏人情的润滑。因此，当省委对行动委员会下达尽快攻城建政的指令后，曾天宇出于他个人的考虑，对省委的指令实际上进行了拖延处理。而当省委和中央对曾天宇行使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时，由于曾天宇的个人资源和威望俱在，职位的被剥夺并不妨碍他继续行使其职权，而上级的处分决定则根本无法得到执行。

（三）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

中共在开展农运和进行暴动的时候，其组织资源往往来自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关系资源，如血缘、亲缘、学缘和地缘等。作为本地出身的共产党领袖，既然以这些传统资源为组织依托，那么，在开展革命中就不可能不注意保护这些传统资源，适当地体现地方利益。但这些传统资源和地方利益又可能与革命的长远利益或形势要求发生冲突。如何处理好地方利益与革命利益之间的张力，主要取决于地方领导人个人的眼光和见识。一个机会主义者固然可以利用制度上的模糊之处和对资源的实际掌控去扩大自己或地方的利益，但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也可以从地方知识出发，清楚地意识到上级命令的非现实性，从而进行变通处理，以避免对党的整体声誉带来不利影响。在万安的事例中，曾天宇虽然没有很强的组织观念，但他有较高的革命理想和较广的见识。因此，他能在万安的革命实践中体现出超出地方利益的革命追求，能利用他的地方权威和资源弥合革命中可能加剧的地方冲突，能从革命和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搁置上级过“左”的烧杀指令。

总之，一个好的党组织关系需要地方干部有超出地方利益的革命追求，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地方权威和资源弥合革命中可能加剧的地方冲突，他们还要逐渐具有“组织观念”，即使对地方或局部利益有损

或与自己的理想冲突,也要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外来干部如果既不能提供任何资源,又不具有较高的个人权威,与地方干部还缺乏任何纽带关系,那么,其指令或纪律处分不是完全失效,就是会激化与地方干部的矛盾。在万安暴动中,曾天宇与省委之间的分歧未演化成严重的冲突,只是因为战事紧张,曾天宇一方来不及做出反应。但我们从万安的事例中已能看出中共组织在早期所普遍面临的一些主要困难。

几乎就在江西省委严厉批评曾天宇的同一时期,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萌芽中的苏区,党内组织都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冲突事件,如1927年8月开始爆发顺直省委事件,1927年12月在湖北发生了党团冲突事件。中共“六大”虽然批评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但并未终结党内关于民主和集中的争执。1929年,顺直省委事件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在国统区又爆发了江苏省委事件,而在红军中又爆发了朱毛之争。1930年12月,赣西南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李文林和闽西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傅柏翠几乎同时遭到整肃。尽管这些事件各自有其复杂的成因,但这些纷争和冲突都或隐或显地展示了本文所揭示的这些张力。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调适还有很长一段道路要走。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安藤彦太郎. 2010.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M]. 李国胜,等,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北平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筹备会. 1929. 北平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概览[M]. 北京: 北平中国大学事务处.
- 陈德军. 2004. 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M]. 上海大学出版社.
- 陈立明. 1988a. 关于曾天宇的入党时间[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内部发行:244—246.
- 陈立明. 1988b. 万安暴动及其历史意义——纪念万安暴动胜利六十周年[J]. 江西党史研究(2):40—46.
- 陈立明. 1988c. 曾天宇[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内部发行:160—185.
- 陈立明. 1990a. 曾天宇[G]//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3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76—96.
- 陈立明. 1990b. 张世熙[G]//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4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13—135.
- 陈耀煌. 2002. 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M]. 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 陈耀煌. 2003. 菁英与群众——北伐前后闽西地区的国共合作与农民暴动[J]. 新史学(14—1):97—140.
- 陈耀煌. 2004. 中共闽西苏区的发展及其内部整肃,1927—1931[J]. 国史馆学术集刊(4):33—75.
- 陈正人. 1988. 从投身革命到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

-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88—92。
- 陈正人.2009. 正人自传[G]//陈正文文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研究室,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411—429。
- 陈宗文.2007. 经营地方:乱世纷争与图强——以萧家璧为例考察民国地方精英与基层权力[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程天放.1986.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 戴向青.1988. 论万安暴动[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211—232。
- 范力沛.1985. 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G]//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95—107。
- 高桥伸夫.1999. 建立布尔什维克党:周恩来与1927—1930年间的党组织[G]//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二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68—180。
- 高桥伸夫.2006. 党と农民:中国农民革命の再検討[M].东京:研文出版。
- 赣县县委党史办.2011. 赣县人民革命史[M].内部发行。
- 耿艳鹏.1996. 他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国民党元老曾振五传略[G]//万安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42—45。
- 耿艳鹏.2005. 万安县城的传统经济和民间风俗[G]//吉安市的宗族、经济与文化(上).刘劲峰、耿艳鹏,编。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29—253。
- 郭敬华.2001. 窑头革命史[G]//万安文史资料(第17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23—29。
- 郭敬华.2005. 万安百嘉镇的墟市经济与民间风俗[G]//吉安市的宗族、经济与文化(上).刘劲峰、耿艳鹏,编。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300—324。
- 郭青.2003. 叛逆的“天子门生”[G]//万安文史资料(第19辑).政协万安县文史委员会,编。内部发行:14—22。
- 郭廷以.1985.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1926—1930)[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 韩一德.1989. 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的史实考察[J].近代史研究(1):303—318。
- 何隆亮.1988. 赣西南暴动为何要以万安为中心?——纪念万安暴动60周年[G]//万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1—6。
- 何隆亮.1991. 万安暴动人物介绍[G]//万安文史资料(第7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7—16。
- 何隆亮.1992. 革命的前沿阵地——万安党组织在学校的活动[G]//万安文史资料(第8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22—28。
- 何友良.2009a. 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J].近代史研究(2):100—117。
- 何友良.2009b. 农村革命早期的外来领导者[J].中共党史研究(5):84—92。
- 黄文治.2011. 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J].开放时代(12):5—26。
- 吉安县委党史办.1992. 曾延生[G]//吉安英烈.吉安地委党史办,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514—519。
-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6.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M].北京:团结出版社。
- 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测绘局.1991. 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乡(镇)分布地图集[M].内部发行。
- 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2007. 江西省人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
- 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7. 江西省万安县地名志[M].内部发行。
-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8. 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M].内部发行。
- 江西省政府统计室.1936. 江西年鉴[M].江西全省印刷所。
- 康克清.1988. 万安暴动后上了井冈山[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

- 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50—154。
- 李博.2003.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剑农.2002.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李维汉.1986.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李先荃.1991.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遂川[G]//遂川文史资料(第2—3辑)。政协遂川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内部发行:96—101。
- 梁鼎新.1988.刘兴汉在自强小学[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93—94。
- 刘锋.1989.江西地方团第一任书记——刘伯伦生平事略[J]//江西青运史研究(1):34—36。
- 刘明生.2010.万安人物[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 刘其农.1981.大革命时期的南昌明星书社[G]//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南昌团市委,编。内部发行:99—104。
- 刘绍太.1984.忆先父刘振群[G]//万安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27—40。
- 刘文渊.1992.万安县教育行政机构沿革[G]//万安文史资料(第8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11—15。
- 罗亦农.1999.江西省委应即搬到农民斗争中心地区去[G]//罗亦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310—311。
- 罗友林.1988.万安暴动与四打县城[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38—148。
- 吕芳上.1994.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 梅建树.1984.郭明达的罪恶史[G]//万安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53—56。
- 南昌市委党史办.1986.黎明中学的创办及其作用[J].江西党史通讯(5):24—29。
- 南昌一中百年校庆办公室.2001.百年树人之窗友情谊[M].内部发行。
- 彭令.1988.万安暴动前的革命斗争[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06—112。
- 彭湃研究史料编辑组.1981.彭湃研究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施有桢、萧皇才等.1988.回忆万泰暴动[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27—132。
- 遂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遂川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遂川县地名志委员会办公室.1987.江西省遂川县地名志[M].内部发行。
- 遂川县委党史办.1988.劫狱营救遂川难友的经过[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18—119。
- 泰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泰和县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泰和县地名志委员会办公室.1986.泰和县地名志[M].内部发行。
- 童扬藩.1986.萧炳章热心办学[G]//万安文史资料(第2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54—56。
- 童扬藩.1987.肖炳章先生传略[G]//万安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13—28。
- 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万安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
- 万安县委党史办.1988.万安暴动综述[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16。
- 万安许氏.1993.许氏家史资料简编[M].内部发行。
- 万芳珍.1985.清前期江西佃民的入籍及土客籍的融合和矛盾[J].江西大学学报(2):49—57。
- 王阿寿.1992.郭化非[G]//吉安英烈。吉安地委党史办,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428—431。

- 王阿寿. 2008. 张世熙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G]//万安文史资料(第24辑). 政协万安县委文史研究室,编. 内部发行:1-10.
- 王才友. 2011. “赤”、“白”之间:赣西地区的中共革命、“围剿”与地方因应[D].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王才友. 2013. 被动与主动之间:江西暴动的策动与终止(1927~1928)[J]. 开放时代(3): 61-85.
- 王健英. 199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王康. 1981. 回忆南昌黎明中学[G]//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 南昌团市委,编. 内部发行:105-113.
- 王龙飞. 2013. 省会、学校、家乡与革命“落地”[J]. 中共党史研究(7): 27-37.
- 王奇生. 2002.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J]. 近代史研究(5): 1-44.
- 王奇生. 2010.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秋心. 1994. 典型的好党员赵醒侗[G]//江西党史资料(第29辑).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81-185.
- 王宇仁. 1988. 同天宇在万安的一段日子[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内部发行:113-115.
- 韦伯. 2004. 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M]. 康乐,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温发铨. 2003. 民国时期的潞田圩镇[G]//万安文史资料(第19辑). 政协万安县委,编. 内部发行:94-99.
- 肖锋. 1988. 奇袭泰和县与四打万安城[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内部发行:120-126.
- 谢一伟等. 1981. 高举红旗战斗不息——曾天宇传略[G]//不屈的共产党人(二). 北京:人民出版社:126-144.
- 薛隆基. 1991. 熊育铎与月池熊氏[J]. 南昌教育(增刊). 内部发行.
- 许秉钧. 1985. 回忆黎明中学[J]. 江西青运史研究(3): 15-16.
- 许大权. 1988a. 攻打遂川城的准备工作[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内部发行:116-117.
- 许大权. 1988b. 毛泽东关心万安暴动[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 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内部发行:133-137.
- 许大权、胡暨和. 1987. 遂万县委联席会议前后[G]//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编.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282-285.
- 许金华. 2013. 社会变迁与乡村革命:赣南农民暴动的源起研究[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许庆华、许衍华、蓝治东、何成钦、许诗蕊. 2004. 习俗相传,乡音永存——记万安潞田许姓、高陂蓝姓、何姓客家[G]//万安文史资料(第20辑). 政协万安县委,编. 内部发行:56-80.
- 许诗蕊. 2001. 横扫妖雾举义旗,艰难岁月斗敌顽——记曾天宇同志武装斗争二、三事[G]//万安文史资料(第17辑). 政协万安县委,编. 内部发行:13-16.
- 杨志荣. 1990. 罗塘乡革命遗址和曾天宇烈士墓简介[G]//万安文史资料(第6辑). 政协万安县委,编. 内部发行:1-10.
- 袁学黄. 1934. 江西共产党的历史观[G]//现代史料(第二集). 香港:波文书局.
- 曾南挽. 1924. 通信[N]. 向导周报:5-13.
- 曾王鼎. 1996. 光荣的村背,英雄的人民[G]//万安文史资料(第12辑). 政协万安县委,编. 内部发行:3-6.
- 曾王鼎. 2007. 中共党史人物与万安[G]//万安文史资料(第23辑). 政协万安县委

- 会,编.内部发行:29—37.
- 曾王鼎、曾伟国.1988.我党在江西最好的朋友之一——曾振五先生[G]//万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40—44.
- 曾伟国、曾王鼎.2006.曾延生在万安[G]//万安文史资料(第22辑).政协万安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1—5.
- 张国焘.1980.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
- 张世熙.1988a.张世熙在“六大”讨论政治报告的大会发言[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54—59.
- 张世熙.1988b.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63—84.
- 赵镛.1958.在朱德同志的培育下——南昌军官教育团生活回忆[G]//星火燎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8—60.
- 振农.1993.江西农民运动概况[G]//江西党史资料(第27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农业大学,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17—119.
- 郑超麟.2004.郑超麟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
- 郑云彪.1985.泰和三十都暴动[G]//泰和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泰和县委员会,编.内部发行:20—24.
- 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1990.中共吉安党史资料(第1辑)[M].内部出版.
- 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中共吉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吉安地区档案馆.1990.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地区组织史资料(1924—1987)[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9.江西英烈[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农业大学.1993.江西党史资料(第27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7.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M].内部发行.
-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档案局.1999.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1922—1987)[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a.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b.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1923.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册[M].北京:北平中国大学庶务科.
- 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编写组.1994.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卷)[M].内部发行.
- 钟汉华.1984.万安暴动前后[J].军史资料(1):31—42.
- 钟汉华.1988.良口党的发展及其斗争片断[G]//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发行:98—101.
- 钟海东.1989.井冈山山下匪首大恶霸萧家壁[G]//遂川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遂川县文史委员会,编.内部发行:57—77.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02.中华著名烈士(第1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钟家柱等.1985.天宇长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中央档案馆.1989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央档案馆.1989b.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 1991. 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年卷)[M]. 内部发行.
-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1986a.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年—1926年卷)[M]. 内部发行.
-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1986b.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8年卷)[M]. 内部发行.
- 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周恩来. 1980.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G]//周恩来选集(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57—187.
- Averill, Stephen C. 1995.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edited by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Armonk, NY: M. E. Sharpe: 79—115.
- Hartford, Kathleen and Steven M. Goldstein. 1989.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ingle Spark: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Armonk, NY: M. E. Sharpe: 3—33.

责任编辑:田青